

相異的經驗、共同的未來：「臺灣與抗戰學術研討會」紀實

胡斐穎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組長

一、前言

在這個世界上，或許很少像臺灣一樣，在面對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經驗時，有著錯綜複雜的情緒。中華民國的對日抗戰勝利，清楚地勾勒出反抗日本侵略戰爭艱辛成果；日本的大東亞戰爭失敗，也明確揭示發動戰爭自食惡果收場。然而，臺灣曾經是大清帝國的一省，因甲午戰爭失利，非自願地被割讓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後，捲入殖民母國向外擴張戰爭，在日本戰敗後，又「歸還」繼承大清帝國的中華民國。站在大國權力歷史之間的交叉點上，臺灣竟顯得如此尷尬。

2015年適逢中華民國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政府舉辦許多慶祝紀念的活動，雖然引發臺灣是否參加抗戰的質疑與熱烈議論，但臺灣卻是因為抗戰的關係，尤其是盟國的勝利，而導致另一個新的命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承辦「臺灣與抗戰學術研討會」，於10月14、15日在臺灣省政資料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發表21篇論文以及1場專題演講，參加人數共計522人次。籌備之初，國史館館長呂芳上即確立本次研討會的主題包含臺灣抗日運動、戰時的臺灣、光復與接收，以及光復初期臺灣的發展，希望將臺灣放在一個寬廣的歷史脈絡，探討臺灣人民反抗異族統治，參與中國抗戰或日本殖民政府活動，乃至於戰後接收臺灣的挫折衝突、鞏固及發展。如果我們將這場研討會專家學者發表論文以國際、國家及個人層次

來看，臺灣歷史的多樣面貌幾乎展露無遺。



「臺灣與抗戰學術研討會」海報
(圖片提供／胡斐穎)

二、國際大歷史

(一) 臺灣主權

臺灣的主權定位，始終是大家爭論的焦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滿紅研究員，同時也是國史館前任館長，受邀專題演講「戰爭、和約與臺灣」，她以國際法中「國際戰爭造成的領土移轉，須經過領土

授受國家和平條約簽訂，勝利者才能取得合法有效統治」的論點為基礎，指出影響臺灣主權更迭的幾場戰爭及條約。首先，甲午戰爭的《馬關條約》（1895年），將臺澎領土完全主權（full sovereignty）永遠割讓日本。其次是二次大戰後，依《舊金山和約》（1951年）所簽的《中日和約》（1952年），尤其是前者第2條及後者第2、10條，日本向中華民國「放棄對於臺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使得原先在臺澎領土上，以及日本統治結束後在臺澎土地上依法產生的自然人與法人，像是日本領臺時留下的臺灣銀行，以及由中國大陸遷臺的中央銀行、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國國民黨等都屬中華民國，而確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主權。即使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亦不影響。此外，南海有爭議的南沙、西沙群島，因與臺澎並列，且釣魚台屬臺澎的領土範圍內，都屬於中華民國。至於，為何日本會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簽約，又是因為1950年的韓戰，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為鞏固亞太防線，而促成雙方簽訂這項和約。

林滿紅強調，臺灣的人民與政府兩度使中國免於亡國，一為甲午戰爭，大清帝國割讓臺灣保住帝國命脈；二為中華民國政府，在中日戰爭期間，藉由與英美結盟保住中國，而有助於中國和平崛起。她認為，臺灣還是要談抗戰，儘管在這場戰爭中，臺灣與

中國處於敵對，也是今日族群問題的重要根源。但從《中日和約》出發，日本戰敗及中華民國接收臺灣，臺灣對日本與中華民國都完成部分繼承。因此，應該要珍惜資產，擺脫包袱，才能加強臺灣的實力。

（二）占領、光復？

鄭梓〈重返 1945：再探終戰之際首批國軍如何登陸臺澎〉，從美國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藏的檔案相互對照應證，發現日本投降後接管臺灣計畫，先由美方擬訂“Occupation of Formosa”，中國則先擬了「收復臺灣五項要點」，後來訂定「臺灣省收復計劃大綱」，顯示所謂「收復臺澎」僅及於接收「領土、人民、治權、軍事設施及資產」，而未觸及「政權」歸屬。占領之初，採取「類似軍政府之制度，以實施軍事管理」，又因「由美方協助進占」臺澎，「海空掩護概為美方擔任，美方須派聯絡組」，保持密切聯繫並提供諮詢，而突顯中美雙方「共占共管」的色彩。之後，幾經折衝，又擴充成「臺灣省佔領計劃」，卻是美方原先所擬計畫的中文摘譯本。故實際上，最後是國軍跟隨美軍渡海登陸聯手「占領臺灣」。因此，就當年而言，Formosa 是一個「被占領的島嶼」。同時，也反思從來就沒有「臺灣光復」？也無所謂「回歸祖國」？被占領的島嶼子民，是否還在上下求索自我的認同？

（三）南海主權

同樣熱門的南海議題，湯熙勇〈臺灣在我國接收南海諸島過程中扮演的角色（1945～1946）〉，認為接收南海諸島的法理，除了地緣及歷史因素外，固有領土觀是主要論述基礎，而日本聲明放棄而取得南沙群島，亦為維護南海主權的觀點。許峰源〈光復初期臺灣與南海諸島的接管〉，則是從南海資源的面向，討論戰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廣東省政府各自依循日本與中華民國管理島嶼的歷史脈絡，爭取南海諸島的行政管轄權，以及西沙群島磷礦開發權。同時，臺灣在中菲、中法爭執南沙及西沙群島主權時，提供詳實豐富的檔案、調查報告、照片及地圖等重要資料，成為交渉的重要依據。

三、戰時、戰後臺灣與原住民

（一）戰時臺灣

臺灣在二戰期間的遭遇，恰好在中國的對立面，曾立維、陳慈玉〈戰時臺灣的廣播事業與民眾生活〉，指出宣傳思想與廣播有密切關係，廣播具有「共時性」效果，收聽者之間會產生「連帶感」，是臺灣人前所未有的體驗。戰爭時期，全島廣播網建立，收音機普及，在臺灣幾乎每十戶就有一台收音機。戰爭宣傳改變臺灣人對戰爭的態度，尤其當戰爭對象從中國轉向英美盟國，中日敵對到東西對抗，將殖民地與殖民母國命運連

結在一起。

張靜宜〈戰時體制下臺灣特用作物增產之分析——以甘藷增產為例〉，因甘藷可提供作為有機溶劑原料，又可作為米穀替代食物，成為日本在戰時獎勵糧食增產的主要代用作物，但由於甘藷是臺灣人所熟悉的作物，儘管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單位培育出許多品種並實驗出較佳種植方法，臺灣人卻仍保有其自主意識，以自己熟悉的品種、栽植方式為之。曾品滄〈配給、黑市與鄉土食——臺灣民眾飲食生活的變遷（1940～1945）〉探討日治末期，雖然皇民化、戰爭動員或物資統制，似乎是日本人居於上位主動者，但在物資統制上，因臺灣人為主要食物生產者，具有堅韌、靈活反制力量。將黑市與鄉土食物活用，不僅確保臺灣人獲得維生所需食物，凸顯在地化優勢，也消解皇民化運動，讓疏開到鄉村地區的日本人不得不正視現實，學習本地人生活方式，反其道實行另一種內臺融合。

（二）戰後臺灣

戰爭結束，讓臺灣人從戰火中獲得解脫，但是，隨之而來的政權交替，複雜的心情與現實的生計，又再度面臨挑戰。歐素瑛〈臺灣省參議會對糧荒問題的救濟（1946～1951）〉，闡述日治末期，在臺灣總督府嚴格糧食管制下，並未發生飢荒。但是，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不久卻爆發嚴重糧荒，民不聊生，為二二八事件爆發重要

原因之一。臺灣省參議員身為民意代表，經常提案詢問糧食是否充足，建議強化糧食政策，要求訂定合理收購價格。但因為政府控制糧食決心甚堅，其詢問、建議未能根本改變政府糧食政策。李巧雯〈戰後初期的農業問題：以臺灣省參議會的議政分析為例〉觀察臺灣省參議員有關農林提案，發現戰後初期農業發展遲緩，糧食缺乏問題嚴重，農民深受剝削之苦，參議員建議政府改良農業、蔗農待遇、參與土地改革政策等，雖不論其質詢建議是否可行，對農林政策推展仍有所助益。

蔡明賢〈論戰後初期臺灣的再中國化政策〉探究 1945 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管臺灣後，執行「去日本化」及「再中國化」，企圖改造日人「奴化教育」，以「三民主義」、「民族精神教育」、「中國文化教育」作為戰後臺灣教育文化核心內容，對於文化事業、教員進行嚴格審查。然因急於廢除日文、灌輸中國意識，使臺灣人感到未受重視，反被指謫「奴化」，無法適應，種下二二八事件的因子。陳佳宏〈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在臺政權之鞏固〉從權力觀點思索，所謂「中國模式」，是以不計手段、代價「鞏固權力」的理念。因而二二八事件對臺灣人是悲劇，但置於中國史中，不過是「小 case」。臺灣人未能領略到中國統治者的本質，事件發生時，輕忽對手，天真想像，而遭致不幸下場。中國在統治權力遭到衝擊下予以鎮壓，展開綏靖、清鄉，完成國

民黨式「開山撫番」，達到實質上「光復」臺灣，鋪陳後來 1949 年來臺的政權鞏固。而二二八給予臺灣人教訓，應該是要正視與強者關係，謹慎處理，當處於權力懸殊的劣勢中，應避免錯估情勢、低估對手，而陷入弱者悲遇。

李君山〈政府遷臺後民眾動員體系的建立——1952 年「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之研究〉，探討蔣中正「以共匪為對象，與之競賽」，又試圖與日本過去五十年統治較量，成立「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報」，發起各級動員月會，進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項改造運動。然而，總動員運動「本體性」並不明確，雖以國民黨黨部為主導，但所討論多為政治議題或規劃，決策及執行都不在黨部，隨著執行的機關團體複雜化，與黨部關係漸形脫離，且在當年人力、物力條件下，期望社會基層響應，亦言之過早，而難持久。

林一宏〈從教育部大樓興建歷程看光復後中央部會新建辦公廳舍之變革〉，以建築角度來看，戰後政府的廳舍基本上沿用日治時期機能相近的官廳建築，但教育部以臺灣大學藥學大樓名義，興建辦公廳舍，借牌上市，卻導致後來土地、產權糾紛不斷。

（三）原住民的徬徨

臺灣原住民曾經這塊土地的主人，但是隨著殖民、統治者前仆後繼到來，他們要對抗的外來者從閩客漢人、日本人到另一波不

同政權的漢人，層層壓迫，逐漸喪失他們的主體性，而引發對自我族群意識的思索。從陳中禹〈戰後初期臺灣「山地教育體系」的接收與建置 1945～1949〉了解到，日治末期臺灣總督府大幅增加原住民受教育人數，成為中華民國接收「山地教育體系」的基礎。但是，卻置於山地行政的架構下，而附屬在民政處（廳），不受臺灣教育體系管轄，導致經費困窘與師資缺乏，教育品質低落。而傅琪貽〈臺灣光復初期原住民民族自救思想〉，以桃園縣復興鄉角板山泰雅族林昭明（Watan Tanga）的「自救」思想及行為，刻劃出原住民在大日本帝國與中華民國不同政權下，竟然都遭受到同樣被迫害的命運，他的祖父 Waran Syat 在 1907 年「大崙崁蕃匪事件」被漢人欺騙，反抗日本失敗；而他雖然是泰雅族少數優秀的青年，在日本小學校讀書，戰後就讀建國中學，但卻都受到日本人或漢人歧視。他或受到馬克思的影響，也接觸像是簡吉等具有左傾思想的漢人，可是他追尋的認同是泰雅族，思索的是如何「自救」、「自覺」、「自治」，但在反共白色恐怖氛圍下，卻被中華民國政府以叛亂罪名判刑。

四、個人的理想與抉擇

當我們從一個大歷史的觀點，深入到個人的境遇時，反而能夠找回真正的人性。抽象的國家情懷、民族情結，在個人面對當前

的時代洪流下，顯得格外空洞，當下真實存在的自我，卻是充滿抉擇與心靈交戰的掙扎，或許有的人，是壯闊地追尋實踐自己理想的道路，也或許有的人，就是本能地想要追求好的生活，或甚至只是單純地生存下去。

談到臺灣與抗戰，李友邦一直是海峽兩岸都推崇的臺籍抗日人士。王政文〈三個英雄：李友邦的歷史形象與書寫〉，突顯不同政治意識型態下，李友邦因在中國成立臺灣義勇隊，參與抗戰，而被視為臺灣的抗日英雄；戰後、二二八事件的遭遇及白色恐怖被處死，進而成為國民政府統治下，受迫害的臺灣英雄；中國則更將他描繪成熱愛祖國的臺灣志士，而賦予當代「統一」政治宣傳的代表。卞鳳奎〈一位協助臺灣抗日的女英雄：嚴秀峰與臺灣少年團的抗日活動〉，則描述一位中國浙江的女子嚴秀峰，在日本侵略國家危難關頭，毅然離家參與抗日活動。結識李友邦後，「鸚鵡俠侶攜手抗日」，協助處理臺灣義勇隊及少年團所有事務，認同臺灣人民為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奮鬥，並共同為抗日工作努力。

孟祥瀚〈戰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臺籍學生——彰化大村賴從俗的生平際遇〉，發掘出另一種在臺灣與中國之間擺盪的臺灣人。賴從俗從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畢業後就前往中國唸書，在民族主義思潮下，與其他臺灣同學，隱身化名羅振鉞，前往日本士官學校就讀，學成返回中國，投身軍旅，

但因所屬部隊非屬嫡系，中原大戰中又歸類為「叛軍」而遭解散，卸甲返回臺灣低調從事貿易經商，擔任豐原郡守。戰後任職區長，二二八事件中保護外省人，後行政區劃調整，因身體狀況而辭職。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在尋求仕途發展的路上，無非就是成為日本政府的高等官；或渡海投效國民政府，一般稱之為「半山」。洪紹洋〈半山、高等官與戰後臺灣經濟〉論及這兩類人士，認為雖然前者不時會被負面評價；後者則常被給予正面讚揚其民族大義，然而一切，無非都是臺灣人在既有條件下力爭上游的行動。當然，因為半山對於中國的語言、官場的嫻熟與人脈，使得戰後在臺灣政商發展，較高等官背景者較有優勢。不過，林德政〈先見與頓挫：張邦傑與二二八前後的臺灣〉，則舉出例外的典型，張邦傑雖然在戰前就參與臺灣革命同盟會，並活躍於中國，甚至在戰後，爭取擔任臺灣省省主席，雖然未果，但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又與陳儀當局不和，未能參與參議員選舉，儘管他向蔣介石反應陳儀缺失，二二八事件發生，要求撤換陳儀，請勿派兵，但都未成。只得暗中通知臺灣人士躲避，事後陳請善後，逐漸淡出政治圈。相較於其他半山得意於政界，他幾乎算是投閒散置。

作為發動戰爭國家的子民，是如何面對這場戰爭。在許瓊丰〈二次大戰下一位日本人的在臺活動：大谷光瑞與臺灣〉研究中，大谷光瑞在「開國進取」的明治精神下，

從 1899 年展開海外探險活動，足跡遍及中亞、中國、南洋等地。1930 年後，實地進行臺灣農林礦工調查活動，參與臺灣總督府產業會議，他構想是以臺灣作為南進出發點，連結南洋、中國華南及滿洲，基本上反應當時日本的國策。戰爭期間，由實業家轉型為政治人物，對戰時體制下臺灣工業化提出建言。

相對的，楊維真〈一個小兵看戰後初期的臺灣——以張拓蕪《代馬輸卒》五書為中心〉，則是剖析一個新政權的平凡士兵張拓蕪，從他筆下觀察臺灣戰後的變化，尤其是他曾經於 1947 年 3 月隨整編第 21 軍來臺，親身參與二二八事變後的鎮撫、清鄉工作。他回憶整編第 21 軍因服裝簡陋、污穢，被臺灣民眾稱為「七渣兵」（即「叫化子兵」），也提及原先駐軍第 70 軍軍紀敗壞，而被稱為「賊仔兵」。還有他們在臺中公園附近如何管理上千名「暴徒」，以及「鹵獲」軍械武器，居然夾雜不少農具。這些文學家的記憶，也都成為史家治史的參考。

五、結語

基本上「臺灣與抗戰學術研討會」是以臺灣為主體，圍繞著戰爭帶給臺灣命運的轉變，進行的學術交流。學者們剖析中華民國在臺灣的主權經由《中日和約》確認，亦有「占領」或「光復」，甚至二二八事件後鎮壓讓臺灣真正被「光復」的幻滅覺醒；也探討臺灣人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以及日本、中國政權轉移下的處境與生存奮鬥；更有從原住民的角度，發現在大國與強勢民族環伺下，更無奈的遭遇。歷史事實讓我們瞭解臺灣在大時代轉折的過去，以及各族群所經歷的一切，即使不同政治意識賦予不同詮釋，但歷史的影響與後果卻是多面向而且多變的。主持研討會第一場論文發表的國史館呂芳上館長曾結語：今天的歷史學者，有自由的空間討論爭議性的問題。在臺灣，族群的經驗各不相同，但都有共同的未來。或許正是對這次研討會最佳的寫照。